



# 编著《滨州通史》 探寻滨州文脉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王光磊

近日出版发行的《滨州通史》首次明确提出滨州是齐文化的发祥地和源头;滨州位于我国古代“东西古道”与现代中国“南北干道”交汇处



2016教师节期间,李象润看望李学勤先生(左),并汇报《滨州通史》编著工作。



传统史志“通纪”“典志”“列传”体例外,还参考了《中华文明史》《山东通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等著作编纂体例及语言风格方面的精华,立志淬炼一部学术精品。

李象润提到的“敢于班门弄斧”,就是贯彻学术民主集中制,组织学术讨论沙龙,大家就某一问题相互争论启发,有时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六年来,共召开编委会会议50多次,形成了15多万字的会议纪要。“光这会议纪要就足够出一本书了。”会议纪要的执笔者刘宝德颇为感慨和自豪地说。

此外,每遇重大困惑,团队难有统一意见时就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文史馆、山东大学等院校单位的专家学者请教学习,特别是向学术顾问当代史学大家李学勤、安作璋两位先生请益。

作为组织者,李象润表示,《滨州通史》不但是写出来的,更是跑出来的,逼出来的,讨论修改出来的。编著过程中,大家不光坐在书房里写,还跑到邹平陵故城,北到北海经济开发区帝赐街村,走遍滨州大地,实地考察全市各县区、乡镇的文物古迹、遗址等,甚至周边各地市的博物馆和有关古迹也去考察过,如考察黄河变迁,专门组织专家到江苏淮安和天津大沽实地考察。

《滨州通史》有两大创见,即首次明确提出滨州是齐文化的发祥地和源头;滨州位于我国古代“东西古道”与现代中国“南北干道”的交汇处

作为对滨州历史的第一次系统学术梳理和著述,《滨州通史》的编著工作带有开拓性和探索性。通读《滨州通史》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创见。其中首次明确提出滨州是齐文化的发祥地和源头;在中华民族历史“东西交汇”“自北至南”发展进程中,滨州始终处于历史发展的制高点和交汇处。

“种种迹象表明,姜太公建立齐国是从中原地区、顺流而下,在济水下游,今黄河两岸的滨城、博兴一带建国的可能性最大,而从陆路到临淄直接去建国的可能性极小。”李学勤指出。编者梳理研究认为,姜子牙落脚地点选在位于古济水下游的薄姑故地,即今滨州的博兴、滨城一带建都立国。滨州一带遂成为齐国文化的发祥祖庭。

齐国前七世从战争到稳定建国的240年间曾两徙其都,先后立国营丘,然后在平定“三监之乱”后迁都薄姑城。两者皆在薄姑境内。到了齐献公时,其都城才开始由西北的古济水下游的滨州一带迁往东南的淄河西岸的临淄,而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相应地逐渐由滨州一带转移到临淄一带。

“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自信地说,滨州是齐文化源头,而不是之一。李象润很是坚定地说,充满着满满的文化自信。”

随着商王朝的东进,至少到商朝晚期,山东北部滨州境内便形成了三条横贯中原与海岱地区的东西交通大道,滨州也成为这三条“东西古道”上最为重要的节点之一。古黄河及古济河作为贯通东西的两条主河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作用。这两条水路也相应成为商人东进的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也是商代晚期商人控制滨州一带海盐资源的重要运输通道,进而使河济之间的广大地区成为商王朝经济、文化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并发展成为商王朝最稳定的大后方。

至少到商代晚期,在河济古道的南边,鲁中山区的北麓,开始形成了一条横贯中原与海岱之间的东西陆路交通大道。东西陆路古道在今滨州南部的邹平礼参、长山等地经过,与现在的胶济铁路线基本平行,略微靠北。滨州邹平正处于这条“东西古道”的中心位置。齐国建都临淄之后,这条位于鲁中山地北麓的东西古道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周王朝控制山东地区的主要经济、文化、交通干道,也成为齐国从中原通向半岛的主要军事交通线。

此外,从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由北而南的转移过程中,包括时至今日东部沿海隆起领跑的新时代,滨州始终处于中国“南北干道”的交汇处。

总之,《滨州通史》十年磨一剑,为我市文化自信建设发力增彩。正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光峰在序言指出的那样:“《滨州通史》的编著是滨州历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填补了滨州没有通史的空白,是滨州文化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天下文脉,以史为宗。一部好的通史著作能指引我们从历史走向未来。

日前,历时六载、全面系统记载滨州发展历程的《滨州通史》终于出版发行。《通史》共四卷,洋洋洒洒110余万字,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国著名文史大家李学勤、安作璋为学术顾问并作序。

《通史》全面记述了滨州自史前文明以来8000余年的文明演进历程,填补了滨州没有通史的历史文化空白。全书分为先秦—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金元卷、明清卷、民国卷,展现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弘毅进程,细数滨州社会形态的次第变化,生动地呈现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典章制度和重要历史人物,囊括着滨州历代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的历史波澜画卷。

通史编著是滨州人的寻根之旅,找准文化坐标坚定文化自信

每天行走在滨州大地上,我们对于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过往又了解多少呢?在我们的记忆中,滨州很长时间以欠发达地区“自居”,兄弟市地相聚只能“敬陪末席”,“追赶超越”成为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主题。

打开《滨州通史》,穿越历史长河,你会发现,滨州曾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书写过众多浓墨重彩的篇章。她或曾是富庶

一方,或曾是独领风骚,或曾是通衢要津。在滨州大地上上演过许多许多的历史事件,有些甚至被搬进了教科书。然而,岁月流淌,风尘弥漫,曾经鲜活的记忆慢慢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和故纸堆中。

如今,我们重读历史不是让大家再做旧梦,而是踏上滨州人的寻根之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所言,坚定起滨州人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可以说,《滨州通史》的编著是一次漫长的寻根之旅和圆梦之行。借助文献资料、考古研究成果、民间传说、馆藏文物等史料,编著者站在全省乃至全国的高度来梳理从史前文明到新中国8000余年的滨州历史,为我们厘清了滨州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而也回答了“从哪里来,现在怎么样,到哪里去”等根本性问题。

只要找准了属于滨州人的文化坐标,深刻地了解滨州人“从哪里来”,才能对“到哪里去”满怀文化自信。

“文章要做百年想”,用足笨功夫打造学术精品

“文章要做百年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主编李象润数次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

希望一百年后,子孙后人从学术上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积极努力。”

“看到《滨州通史》较高的学术水准,我眼前为之一亮。”对于《滨州通史》的出版,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教授很是激动。

能让这位当代史学大家“眼前为之一亮”,这很不简单。全国300多个地市州盟,能够写出通史著作只有极少数地市。之所以难写与体制等因素有很大关系。“现在优秀的文史精英大都集中在大城市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在地市一级编著通史著作着实困难,尤其学术团队难以组织。”李学勤先生在序言里直言不讳地说。

“打造学术精品很难,需要用足笨功夫,需要搞好顶层设计,也要敢于班门弄斧。”对于如何将《滨州通史》打造成一部精品,“操盘手”李象润事后总结说。

所谓“用足笨功夫”,首先就是最大限度汲取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同时将滨州高校、县区、史志等部门单位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研究和吸纳。

在《通史》编著过程中,编委及编审李沈阳、王凤翔、刘宝德、张基地、侯玉杰、张卡、张永军、徐清刚、王剑、李观伟等专家学者分工负责,放弃周末、节假日的休息时间,不计名利,甘于奉献。

除了花费笨功夫,通史的编著更需要“顶层设计”,确立统一的学术标准和体例,尽可能发挥每一个团队成员的学术专长。《滨州通史》的编著,学术水准上除借鉴

## 美哉,邵兄

——怀念著名作家邵勇胜

段剑秋

有城府的美男呢?

文友相亲

来匆匆,走匆匆,自此一别,竟然久未见面。邵兄家在高青县,我在滨滨工作,黄河相隔。后来地区成立创作组,邵兄调来当组长,我也调到创作组,学习、开会在一起。虽说同在创作组,交往并不多,因为我到创作组以后便参加了当时最为时髦的“三结合”长篇小说写作组。

这是个精心挑选的三人小组,有“出思想”的领导带队,有我这个退伍兵,还有高青县的一位农民作者,三人三类型。

邵兄从小创作规律上发表意见,说作家写作是自身素材的积累与思想火花的迸发,他离开大都来到地区,觉得身边空荡,再加当时强调“高、大、全”,脑袋里进不出时代的火花。我十分赞同邵兄之见,说创作是作者思想的产物,不能由领导人“出思想”,尤其是反对领导人“我让你咋干你就得咋干”这是典型的雇佣思想。

创作组解散以后,邵兄当了艺术馆馆长(副馆长、副书记)。因为地区驻地是滨滨县境内,我仍然断不了去艺术馆看望邵兄。邵兄总是鼓励我,同时感叹当馆长事务太多,他的脑袋静不下来思考小说情节。我突然发现:邵兄的创作之源不是这里那里去采访,去体验,而是在他生活了半生的大都村。他离开大都村,便断了文学艺术的生活之源!

他从不谈论别人的缺欠,就是听说哪位作者出什么问题,也总是为其辩护:“人无完人,责任不全归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邵兄外出参加一个什么会议,有一位自称邵兄好友的年轻人来到大都村他的家中,说与他如何亲密交往。妻子认为真是邵兄的密友,好一番招待。不料会议提前结束,他回家来,发现这人他不认识。妻说:“这定是个骗子,叫人抓起来吧。”邵说:“不可,他喜欢文学,就是文友,天晚了,留他住一宿吧。”这人自觉无颜,他却依然以友相待,与其好一番交谈文学。读《大都村纪事》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他家传美德!

原沾化县、现东营河口区文化馆长杨海

田,说起他文化站长由民办“转正”的事情,感受最深:“我与邵兄没有过多交往,仅在学习班上见过几面。可是,在转正的事上,听说邵兄为我力争。虽然有人阻挡,那次我没能转正,却知邵兄是个大好人。可信,可交!”

文人相轻是文化界的一大顽症,邵兄却有文友相亲的美德。正因如此,三十年后我搞《黄河三角洲民间文学研究》,到惠民县、无棣县、阳信县、邹平县、广饶县、沾化县、东营河口区采访的时候,遇到那些已经头染白发的文友,他们总是首先问候:“邵兄可好?”不是一般寒暄,而是怀有真切的感情,都把他当作可敬的兄长。

我久久地思考,一个人能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心目中,需要对朋友付出毕生的精力,需要用正义、用真诚去精心地栽培、浇灌,日久天长,才能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这些,邵兄都做到了。

我眼中的《大都村纪事》

邵兄虽然成名很早,但作品不多,因为他的创作旺盛期正值“文革”。进入老年,才能静下心来,慢慢地梳理早年往事。这便有了《大都村纪事》。我接到赠书,立即拜读,真真领略到醉人的乡风民俗、美妙的田园风光、传统的伦理美德。尽管有人说三道四,我却认为此书乃邵兄的文墨精华,闪烁着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光彩。

中国传统文艺美学,强调文艺的民族性。翻开《大都村纪事》卷一,便是大都十景:邵氏家庙、棋盘街、邵家寺、刘家湾、康生胡同、上马台、李家胡同、南大门、叫花子坟、南墓田,短则千余字,多则二千余字,十景致仅占了二十个页码。无有刻意雕琢涂彩粉饰,皆平平地叙来,但让人觉得津津有味;再加上后面的济水、竹马、京剧班、庙会、油房、清明、春节等纪实,描绘出大都村在渤海平原的整体坐标。

《大都村纪事》具有很强的自然美。尤其是《乡土情怀》一卷,二十多个人物,笔者“俯拾即是”,且皆“著手成春”。譬如《庄稼汉们》中名叫“峰”的这个人:“是住亲戚家才

来到大都村的,是一筐一担的家产,是真正的手白起家。”他家离水井远,“担着水他要思考,因而也就形成了吸旱烟较勤的习惯,也可能是缺火柴吧,或许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火柴,他把半着半灭的烟核磕在扁担的平面上,把装好的旱烟再对准半灭的火种,于是新的一袋旱烟又点着了……日久年深,担过多少水无法知道,他的扁担上有一浅浅的烧糊的坑。那是一个创业的纪念,一个陪伴星星走路的标志。”

真实,是《大都村纪事》的又一美。“大都风情”也罢,“乡土情怀”也罢,“家族人物”也罢,“乡里余梦”也罢,一篇又一篇,皆以“我”的听闻所见——道来,是中国传统的实录笔法。写那位启蒙老师绳武哥,没有隐瞒老师的五音不全,唱起歌来“像老和尚念经”,土改时自己借估形势下跪,以致闹出一生的坎坷,让人悲悯。写村支书邵祥阶,既写他三十年稳坐书记宝座的清正廉洁,“文革”中的高风亮节,又写他挨饿时犯的错误:“他晚上看仓为名,十二点过后,煮一顿地瓜干吃,还派一人在门外放哨。”“小四清”时他带头做了检讨,每人赔偿瓜干三十五斤”。

尽管《大都村纪事》用实录的笔法,语言朴实,白描无饰,却也篇篇蕴理涵情。最可说道的是“祖父的精神”。为了全村免遭土匪火烧,祖父冒死前去给土匪送馒头送肉;为了全村的吉祥,祖父不怕得罪人,接了“泰山会”的账房之职;盼望子女出人头地,却又不让子女读书,说是“念书耽误过日子,越念越不下力气干活,更不知道地咋种。”祖父会治家,以女人为主纺线织布,男人为主开粉房,用勤劳的汗水赢得全村的赞扬。土改分地,祖父坚决不要,说财产还是靠自己挣,只有创业才知道守业,不然后代出败家子……祖父的这种正直、本分、勤劳、善良,也有点固执、愚昧,充分体现出中国乡民千年传承的仁义之“道”。“文以载道”,正是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最大的民族特色。

美哉,美哉。邵兄的美文来自美德,堪为我等楷模!

(作者:段剑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滨州市作家协会原主席,研究馆员,是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出版长篇小说及民间文化研究著作多部,曾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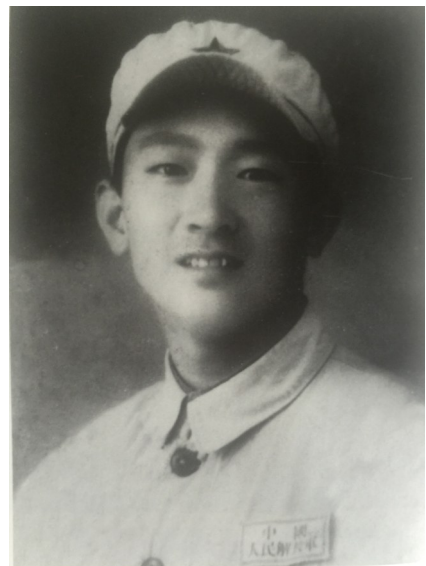
2010年邵勇胜。拍摄于家中书房。

初识邵兄

第一次见邵兄,是在一九七二年“文革”期间。那是个火热的夏天,惠民地区组织全区的文学爱好青年修改作品,大家住在地区招待所东边靠北的一排平房。没过几天,山东省著名作家王安友来了,头戴一顶农家大草帽,一副庄稼汉的架式,对我们震动很大。“看,人家是大作家呢,多么朴实!”我那篇《盐碱窝里绘新图》,就经过他的指导,后来收入《火花》小说集。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邵勇胜到来。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参加学习班的作者名单上没有他。他正在我住的房前经过,同房的文友告诉我:“那人就是邵勇胜,著名的农民作家。”我读过他的《二爽赶车记》,脍炙人口,于是赶忙扭头望去:较高的个头,白皙的皮肤,英俊的脸面,走路挺胸昂首,沉沉的步子,稳稳的神态,慢慢的话语,目不斜视。他边走边与陪他的人说话,声音轻而沉稳,我听不到。文友问:“你与他有无交往?”我摇摇头说无。文友介绍:“他是高青县大都村的党支部书记。”

我默然,但充满疑虑。看他那挺挺昂扬的气势,稳稳沉沉的神态,分明胸罗锦绣,说大学教授也有人信,怎么才是个村支书!我家在农村,入伍前当过本管区的团总支书记,跑遍管区所有的村庄,与许多村支书和大队长们有交往,他们多被生活的艰辛累弯了腰,被风吹日晒晒黑脸,见面嘻嘻哈哈,粗俗大于文静,哪有如此白净、英俊、文质彬彬、胸



1957年,邵勇胜在部队服役时,第一次学着投稿,便投中了,1957年12月份的《解放军战士》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作品,题目叫《话谈45号》。这是他当时在烟台拍摄的照片。



1964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从全国选出12名优秀作者到北京学习两个月。这是邵勇胜在北京八大处学习时与同期学员合影留念。后排左二为邵勇胜。